

·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

历史、  
发展、  
人物与  
视角

# 德国汉学：

主编

[德] 马汉茂 汉雅娜  
[中] 张西平 李雪涛

Chinawissenschaften-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大象出版社

*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herausgegeben von Helmut Martin und Christiane Hammer,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9. 版权由汉堡亚洲学研究所免费授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德]马汉茂等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11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任继愈主编)

ISBN 7-5347-4021-5

I. 德... II. 马... III. 汉学-研究-德国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0239号

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德]马汉茂 汉雅娜 主编  
[中]张西平 李雪涛  
李雪涛等译

责任编辑 魏淑民 特约编辑 徐文堪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王翠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23.25

字 数 581千字 定 价 49.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 编辑委员会

- 顾 问：郝 平 (Hao Ping) 陈翰笙 (Chen Hansheng)  
季羨林 (Ji Xianlin) 李学勤 (Li Xueqin)  
饶宗颐 (Rao Zongyi) 汤一介 (Tang Yijie)  
王元化 (Wang Yuanhua) 周一良 (Zhou Yiliang)
- 主 编：任继愈 (Ren Jiyu)
- 执行主编：张西平 (Zhang Xiping) 周常林 (Zhou Changlin)  
耿 昇 (Geng Sheng) 杨煦生 (Yang Xusheng)
- 国内编委：程裕祯 (Cheng Yuzhen) 高建平 (Gao Jianping)  
顾 钧 (Gu Jun) 何其莘 (He Qixin)  
李明滨 (Li Mingbin) 李雪涛 (Li Xuetao)  
柳若梅 (Liu Ruomei) 孟 华 (Meng Hua)  
任大援 (Ren Dayuan) 汪前进 (Wang Qianjin)  
谢 方 (Xie Fang) 严安生 (Yan Ansheng)  
阎纯德 (Yan Chunde) 严绍璁 (Yan Shaodang)  
杨保筠 (Yang Baoyun)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周发祥 (Zhou Faxiang) 朱政惠 (Zhu Zhenghui)
- 国际编委：李福清 (Boris L. Riftin) 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常志静 (Floria C. Reiter) 杜德桥 (Glen Dudbridge)  
陈志让 (Jerome Chen) 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  
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柳存仁 (Liu Ts' un-yan)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罗致德 (Otto Ladstätter)  
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史华罗 (Paolo Santangelo)  
安乐哲 (Roger T. Ames) 陈荣照 (Tan Eng-Chaw)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杜维明 (Tu Weiming)  
弥维礼 (Wilhelm R. K. Müller) 伊维德 (Wilt L. Idema)

##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sup>①</sup>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在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在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

---

<sup>①</sup>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从20世纪初到现在。

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像。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 三、海外汉学研究丛书(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能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我们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 朗宓榭教授<sup>①</sup>贺词

原版《德语世界的汉学发展：历史、人物与视角》一书是由马汉茂(Helmut Martin)教授策划并主编的一部论文集。其起因显然是由于德国汉学的卓越贡献，这不仅表现在汉学的国际发展进程方面，同样表现在对中国哲学、文学、语言和政治、经济和社会史以及物质文化的认知上。令人诧异的是，在马汉茂之前竟没有其他德国学者把这一课题作为整体研究对象而予以全面关注。德国分裂局面的终结，无疑促进了这一课题研究的展开。即使这样，如若没有马汉茂的远见卓识及其求知探索的精神，要总结德国几百年来对中国精神的把握和人文关怀以及一百年来的汉学学院传统，我认为是无法想像的。马汉茂充分发挥他的学术底蕴，加之天时地利，成功推动了这样一个宏大的项目。

在本书的研究成果中不乏自我批评的声音，鉴于学术和政治一度过于密切的关联，这也是不足为怪的，而汉学同样也无法逃离政治的桎梏，德国汉学和其他国家的汉学相比也不例外。有关汉学研究中有没有“德国特点”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然跟其他西方国

---

<sup>①</sup> 现为德国艾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中远东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汉学系系主任、讲座教授。

家相比,德国汉学时间上的错后尤其是学科建制上的时间较晚,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但就德国汉学家的科研重点而言,除了某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特点之外,很难勾勒出所谓的“德国轮廓”。我们最多可以在众多的研究兴趣中看到德国汉学对中国的思想史尤其是对儒学有一定的侧重。

本书史料翔实充分,有很高的价值,应能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我想,英年早逝的马汉茂一定也是对本书抱着同样期望的。如果他九泉有灵的话,也会为本书进入中文世界而倍感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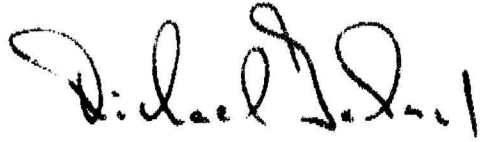
如果将来我们对西方汉学做一步的审视,那么应该更多地瞄准它和西方经典学科传统的联系,因为汉学是置身于西方的学科传统之中的,所以影响这门学科发展的许多理论和信息来自于其他西方学科的研究成果。反之,我们同样应该着重探讨汉学在哪些学术讨论中起到了领军作用,哪些“关键词”源于汉学,如哥罗特(de Groot)的“宇宙宗教学说”(Universisimus)和魏特夫的“水利社会”(hydraulische Gesellschaft)就是典型例证。西方汉学在消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其研究主题又常常是西方时代精神的产物。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关注程度愈来愈高,海外汉学已经成为了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领域。在为数众多的研究机构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持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对原典的翻译工作是非常突出的。本书中译本《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及视角》翻译难度很大,正是在该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和李雪涛副教授的精心组织、策划下才得以顺利完成的。我对这两位中国同事的努力深表敬佩。

衷心希望本书的中译本能够在中文世界赢得更多的读者。对中文读者来说,德国汉学所认知的对象由于其主题可能比其他的理论范式更为熟悉,或许能够成为沟通促进两个文明相互理解的桥梁。草成此文,无非是借本书中文本出版的机会,简略地表述自己的感想



和期望,聊以充为贺词。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Lang Bishu' in a cursive style.

## 德国汉学的沧海桑田 ——中文版序

汉雅娜(Christiane Hammer)/著 李雪涛/译

在理想的状况下,人们可以从当代的视角出发,将历史看做是未来,而历史对后代的作用正在于此。在回顾德语地区的汉学历史时,这句话则意味着:我们尝试着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整理以往的经验,去分析、诠释它们,以期从中得出结论积极规划未来。

以上正是原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ät Bochum)汉学系教授马汉茂(Helmut Martin)所深切关注的,在他担任德国汉学协会(Deutsche Vereinigung für Chinastudien—DVCS)会长的时候,曾于1997年10月24—26日在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举办了题为“汉学——德语世界的发展:历史、人物、视角”的第八届德国汉学协会年会。马汉茂深知,仅这次年会的举办地就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在百余年前的1887年,正是在这所——当时还是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命名的——大学里,成立了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OS)。这是在当时整个德意志帝国中惟的一个为新上任的外交官和派往殖民地的官员教

授汉语的地方。<sup>①</sup>

## 二

马汉茂教授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和当代的文化和文学具有渊博知识的行家,同时也是周围人的热心朋友。一直到他去世的1999年6月,在几乎四十年的时间里,他都为其他人工作着。作为译者和主编,他出版了不同名人的著作,如李笠翁(李渔)、毛泽东和邓小平。汉学就是他的整个生命所在。基于他在汉学方面的丰富经验,马汉茂在他的祖国考虑了哪些课题和想法,这又如何成为他选择上次年会主题的动机,所有这些读者都可以在本书的德文版前言中读到——这个前言正是此论文集初版时的序言,未做任何改动。

八年对人的一生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繁忙的科研生涯中。其间马汉茂以及1997年年会的论文和众多的报告人本身就成为了汉学史的一部分。由他主持的对德语地区中国学历史的思考和评估,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失去其精辟与真实。自1999年初本书出版以来,联邦德国教学和研究状况的发展比马汉茂教授当时所担心和所能预料的更具有戏剧性。整个学术领域的情况非常糟糕,而汉学作为一个“小”专业,跟法学和日耳曼学这些有较多学生的专业相比,形势更加严峻。

并且祸不单行。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出现的问题,裁减职位、削减财政开支以及对教学计划和考试改革的不断评估成为了德国高等院校的家常便饭。在中国学领域,尽管学生的人数

---

① 顺便我还想提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坐落在当时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柏林的大学,以普鲁士的科学家兄弟威廉和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名字重新予以命名,借此名称以示反对普鲁士军事黩武主义那具有毁灭性的传统路线。因此洪堡大学这一“高尚”的名称,得以在1990年民主德国瓦解、两德统一后保留至今。本书中的几位作者,梅惹华(Eva Müller)、费路(Roland Felber)、贾腾(Klaus Kaden)、尹虹(Irmitraud Fessen-Henjes)以及屈汉斯(Hans Kühner)正代表着这一具有丰富传统的洪堡大学汉学系。

不断下降,政府还是通过尝试着引进以美国为样板的、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普遍得到承认的学士和硕士课程,来实现欧盟统一化的规定(中心词“博罗尼亚进程”, „Bologna-Prozess“<sup>②</sup>)。而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的精力都耗在了高等院校的官僚机构上,而没能用在科学研究的本身。

所有生活领域不断增长的经济化,也同样导致了研究内容的浅显化和平庸化。例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和法专业的学生除了他们的主专业之外,也想学“一点儿汉语”,因为他们自以为和中国的贸易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这样便能为他们将来找工作增加一些所谓的“砝码”,这只能对汉学的学习和教学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在四个学期之内既要学一定的汉语语言知识,又要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鉴于在新的条件下,存在着尽快结束学习的压力,因此,以往在基础阶段学习后要在中国学习一年或多年的强制措施——这样可以加深他们所学的对中国的理论方面的知识,并且可以亲身熟悉一下这种陌生的文化——被迫削减为几周的活动,或者干脆予以取消。

### 三

汉堡亚洲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Asienkunde—IfA)的舒赫尔(Günter Schucher)在1997年的汉学年会上所做报告的题目为“德语国家高等院校中的汉学——机构概览”,跟今天令人失望的情形相比,当时他

---

<sup>②</sup> 2003年,来自四十多个欧洲国家的教育部长与欧洲委员会、欧洲重要大学的校长及学生代表共同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会议,制定了所谓的博罗尼亚缔约国的政策性义务。协议规定,到2005年为止,各个国家都应完成高校内外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国际学士与硕士两级学位要全部引入,毕业生将获得一份统一的、多语种的毕业证书增补件(Diploma Supplement),以便不同学历在高校及劳动力市场上能够得到相互认证;博士生阶段的学习被列为博罗尼亚进程的一个新目标并对此进行了定义;各个高校必须自主建立起内外评估机制;各国教育部将采取措施帮助学生解决国外留学费用问题。——译者注

所得出的结论从总体上来讲还是好的。他对当时情况的分析(由于此文的内容已经过时,作者也不愿更新其中一些内容,因此中文版未予收入)清晰地为我们描绘出了 90 年代末的情景,同时在今天也成了瞬间的历史定格。此论文在细节性的描述上跟埃克哈德(Maren Eckhardt)对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系(Fakultä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FOAW)所做的示范性的描写相类似:即使是这个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依照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计划而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在马汉茂教授去世后也加快了其衰败的速度。1992 年由马汉茂创建的卫礼贤翻译中心(Richard-Wilhelm-Übersetzungszentrum—RWUZ)及其所属的一家专门图书馆,现在也将管理费用缩减到了最低限度。在马汉茂去世前不久,他还倡议建立了“台湾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search Unit on Taiwa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此类机构在联邦德国尚属首家,但目前它也处于资金匮乏和缺少资助的困境之中,而伦敦亚非学院(SOAS)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类项目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另外一个趋势是,当时遍布在整个德国的较小规模的汉学系——有一部分是 20 世纪 60 年代才建立的,有被取消的可能。它们之中有的已经被取消(如马堡 Marburg),或者被敦促进行相互间的合作,甚至从长计议要与其他地区的汉学系合并[这牵扯到例如杜伊斯堡(Duisburg)、科隆(Köln)以及明斯特(Münster)的汉学系]。所有有汉学系的地方,包括海德堡(Heidelberg)、慕尼黑(München)或汉堡(Hamburg)等较大的汉学系,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问题,并和政府就削减教学人员的计划进行着斗争。

作为红—绿联邦政府改革运动的一部分,2002 年设立的所谓“青年教授席位”[Junior-Profesuren,汉学方面例如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M)以及格尔默尔斯海姆(Germersheim)],并没有对上述的困难起到真正的补救作用。这一方案的初衷是让那些年轻的学者尽可能快地进入由他们个人能独当一面的教学工作当中去,而不必浪费更多的时间来做在德国传统上进入教授席位之前的“教

授资格论文”。这样的“青年教授席位”当然也有其缺陷,也就是说这样的席位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三年之后不能续签。之后的情况没有谁能知道。这种无着落感以及一直存在的大学中教授位置奇缺的困惑,使得我们书中的作者在过去的几年中,或者离开了德国[如柯马丁(Martin Kern)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或者离开了学术领域——这更多地涉及到女汉学家们[例如雷丹(Christina Neder)现于一所文理中学教书;舒欣(Astrid Freyeisen)在上海的电台做记者;郭德弗斯(Gabriele Goldfuss)是莱比锡市市长的外国事务负责人]。

就连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柏林洪堡大学的汉学系,它是著名的亚非学院的一部分,也由于经费的原因在劫难逃,成为了“气数已尽的样板”:目前由屈汉斯教授主持的现代汉语与文学,其解散的宽限日期为三年。之后,谁在柏林还想了解一些有关现代中国的情况,就只能去该城西部的自由大学了。1990年民主德国解体后开始了对组织和人员的“清算”,这种在政治上让人感到不快的行为,正是由于其对德国首都所采取的在财政和科学政策上的短见而以整体的失败而告终。偏偏柏林是北京的友好城市,并且一有机会(例如在每年都举办的“亚太周”活动中)就扮演所谓“开放的大都市”的角色,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嘲讽?

另一方面,尽管(或者说正是因为)几年来在教授席位的分配和研究领域的定义方面存在这些日常问题,但还是能看到一个“语文学意义上的转变”(philological turn),也就是说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中退回到传统汉学意义上的对经典以及最古老文本的诠释上来,这既可以理解为固执的逃避现实主义,也可以认为是历史的辩证法。

鉴于所有这些危险的趋势,德国亚洲学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sienkunde—DGA)于2004年以全体亚洲学研究者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对德国亚洲学现状的说明》的紧急呼吁书。在这份声明中,控诉了政治决策者们的犹豫不决:“鉴于德国和欧洲经济的形势,与亚洲的关系越来越显得重要。……因此今天对亚洲的知识以



及对亚洲人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然而这一认识和理解需要学术基础……这恰恰跟亚太区域的重要性形成可笑的对比：在德国高校中亚洲学的机构急剧锐减，目前，这点在德国到处都显现出来了……”[见：《亚洲——德国有关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刊物》，第92辑（2004年7月），第1—2页]<sup>③</sup>

作为结论，2005年底有更残酷的事实：在中心词“失去社会重要性”的背后可以确信，联邦德国政府有计划的对外政策显然不需要汉学方面的咨询也行，或者说他们的决策常常是跟汉学家们的意见背道而驰的。并且德语世界的汉学以世界的标准来看，不再有什么重要的作用了。特别是跟英语国家的汉学即美国的汉学相比较，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美国汉学都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互联网上现存信息的全球化正显示出，德国的汉学之路越来越深地走向了穷乡僻壤。

#### 四

如果有人说这部论文集的德文版奠定了德国汉学的基础，并且是有关德语国家汉学研究不同视角的无数新研究的“催化剂”，那么这一说法确实并不为过。由张西平教授组织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中还包括傅熊（Bernhard Führer）有关奥地利汉学的研究专著《遗忘与遗失》<sup>④</sup>以及冯铁（Raoul Findeisen）有关瑞士汉学的著作。因此我们就没有将这两位学者的论文收入此中文版中。日内瓦的学者祖飞来（Nicolas Zufferrey, Genf）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论文涉及到了法国的视角，这也将在他自己的书中予以详细解释。

当然其他的报告人在过去的几年中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也发表

---

<sup>③</sup> Publiziert in: *Asie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Wirtschaft und Kultur*, Nr. 92/Juli 2004, S. 1-2.

<sup>④</sup> 德文书名: *Vergessen und verloren*, Bochum, 2001。

了历史学或统计学方面的新论文,例如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许翰为(Hans-Wilm Schütte)<sup>⑤</sup>或舒赫尔(Günter Schucher)<sup>⑥</sup>。对于本书的其他作者以及我们年会的多数与会者来说,这次的会议至少让他们有个停下来喘息的时机,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进行自我反思。因为从事中国研究是一件困难重重、永远不会有尽头的工作,这一点很少有人知晓。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审视我们这部有关汉学历史与现状的德文版的论文集,同样也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中选出中国学者始终感兴趣的论文。在与张西平教授和李雪涛博士经过多次商讨之后,我们对每一篇德文版原文的利弊得失仔细斟酌,看中国读者从中究竟可以学到哪些对他们的工作有利的东西。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好回答的,特别是这部书自第一版之后又经过了几年的岁月。我们是否选择得当,或者说这些翻译过来的论文是否有价值,读者自有明鉴。

所有收入在中文版的论文都是由每一位作者审读、补充了新内容并且修改过的。其中也就鲍吾刚(Wolfgang Bauer)在题为《几点说明》(*Einige Bemerkungen*)<sup>⑦</sup>的德文版的书评中对一些事实的说明和澄清做了修正。

在两位中国同事的建议下,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解决的方案,除了上边提到的傅熊、冯铁、祖飞来以及舒赫尔的论文由于内容的原因或者缺乏现实意义之外,下面几篇论文中文版也未收入:唐田慕(Tim Trampedach)的介绍90年代中国在德国媒体和广告中的形象

---

⑤ *Die Asien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Geschichte, Stand und Perspektiven*(《德国的亚洲学:历史、现状和视角》), 2. bearbeitete u. erweiterte Aufl., Hamburg 2004: *IfA-Mitteilungen*, Bd. 380, 481 S.

⑥ *Ostasienbibliotheken in Deutschland. Probleme, Perspektiven, Fördermöglichkeiten*(《德国的东亚图书馆:问题、视角及资助渠道》), Hamburg 2001: *IfA-Mitteilungen*, Bd. 332, 114 S. + 16 S. Tabellen.

⑦ *In Asie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Wirtschaft und Kultur*, Nr. 76/Juli 2000, S. 105 - 118.

的论文,<sup>⑧</sup>这是一篇学术通俗读物,或者说是记者所写的新闻报道性质的文章;李希特(Gunnar Richter)有关在民主德国科学院编写《汉德辞典》的编辑背景知识介绍,李氏对当时的档案资料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sup>⑨</sup>以及哈恩(Thomas H. Hahn)对数据库以及网上资源的思考,<sup>⑩</sup>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篇有关汉学与互联网的文章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了。

我们非常高兴在中文版中可以补上德文版的一个很大的漏洞,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1999年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而遗漏了:这就是由吴素乐(Ursula Ballin)撰写的有关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传记性文章,卫礼贤也许是当时中国和德国文化和精神世界间最重要的使者了。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那些参与到1998年德文版中来的而在过去几年中不幸去世了的作者,除了马汉茂之外,还有费路、哈尼师(Thomas Harnisch)以及君特·列文(Günter Lewin)。

## 五

不论是马汉茂教授还是我,在1998年底将这本最初的会议论文集整理出版的时候都没敢奢望,有朝一日要找中国的同事将这部论文集译成中文出版。我们要真诚地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张西平教授和李雪涛博士,正是他们给予了这部论文集以高度的评价,并出于尊重德国汉学的初衷,将这部论文集纳入了他们和中国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之中予以出版。

⑧ „Bilder von Fremden. Die Deutschen und China“ (陌生人的形象——德国人与中国)。

⑨ „Die Entwicklung der sinolog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an der Berli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as Chinesisch-deutsche Wörterbuch“ (柏林科学院的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以及《汉德辞典》)。

⑩ „Neuland für Chinawissenschaftler. Datenbanken und vernetzte Ressourcen“ (汉学家的新天地——数据库与网上资源)。